

Illustrated Handbook of Common
People's Collection

百姓收藏图鉴

□ 湖南美术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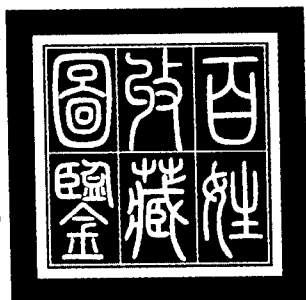


文
房
用
品

Illustrated Handbook of Common
People's Collection

百姓收藏图鉴

欣弘 主编



文房用品

湖南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百姓收藏图鉴——文房用品 / 欣弘主编. —长沙: 湖南美术出版社, 2007. 8(百姓收藏图鉴)

ISBN 978-7-5356-2771-1

I. 文... II. 欣... III. 文房用品—收藏—中国—图集
IV. G894-6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31634 号

本图书所采用图片由深圳市雅昌艺术网有限公司提供

《百姓收藏图鉴——文房用品》

主 编: 欣 弘

策 划: 易兴宏

责任编辑: 李 坚

责任校对: 李奇志

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·发行(长沙市东二环一段 622 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制版、印刷

(本书采用 CTP 工艺制版、印刷)

开本: 889 × 1194 1/32 印张: 6

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56-2771-1

定价: 48.00 元

【版权所有, 请勿翻印、转载】

邮购联系: 0731-4787105 邮编: 410016 网址: <http://www.arts-press.com/>

电子邮箱: market@arts-press.com

如有倒装、破损、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灵秀儒雅说文房	1
笔	23
笔洗	28
笔架、笔搁	56
笔插、笔挂	68
笔掭	71
墨	80
墨床	89
纸张	93
镇纸	94
砚台	101
水滴、水注	119
水丞、水呈	125
水盂	129
臂搁	143
印玺	155
印章	158
印盒	165
砚屏	179
其他文房用具	184

灵秀儒雅说文房

唐代诗人杜牧在他的《奉和门下相公兼相印出镇全蜀》一诗中提到“文房”，说“彤弓隋武库，金印逐文房”，显然指的就是书房。宋代的吴自牧作《梦粱录》，其中谈及士子赴试唱名，说“止(只)许带文房及卷子”，“文房”似乎便成了笔墨纸砚。其实不然。这个“文房”是个简略句，即“文房用具”的简略，“文房”依然是书房。

古人之于书房是颇讲究的，譬如要摆几设案，譬如要窗下焚香，还要窗明几净，还要东窗瘦竹南窗菊，这才算是个清静优雅的存在。韩昌黎有句名言，叫“出宰山水县，读书松桂林”，吴昌硕将其书而为联，又作尺竹精刻，挂书案两旁，书房便又多了些藏龙卧虎的高远深旷。

陆游诗中“水复山重客到稀，文房四士独相依”的四士，说的便是梅尧臣笔下“文房四宝出二郡，迩来赏爱君与予”中的四宝了。文房因了这四宝，便格外的儒雅风清逸致浓了，古人将其归列为清供之物，等之以岁朝清供、山家清供之类，又格外地讲究“四宝”之质地、造型、装饰，视之为友，名之为宝，凡文人士子，当真不可一日无此君的。正因为如此，“四宝”便也有身世，有地位，有讲究，有传奇了。

据说李白曾做了个好梦，梦见自己常用的那支毛笔竟然头端开出一朵艳丽的花来，大吃一惊，醒了。从此，李白下笔如有神，文

采大进。而南朝人江淹梦笔传奇更为神妙。据说他少年时春日得梦，有人赠他五色笔，从此才思敏捷，官至光禄大夫，封醴陵侯。晚年又得一怪梦，原先赠五色笔者竟向他索回其笔，江淹从此作诗文味同嚼蜡，后人谓之江郎才尽。

笔始自何时说不确凿，晋人崔豹作《古今注》，说笔“自蒙恬始造，即秦笔也”。但学者以为此说不可靠，笔理该是创自蒙恬之前，他只不过是改造完善罢了。1975年12月，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发掘出三支竹管毛笔，且有竹制笔套，与《通训·定声》所载“秦以所为笔”互为印证。东汉文字学家许慎著《说文解字》，提到“所以书也，楚谓之聿，吴谓之不律，燕谓之弗，秦谓之笔”，似乎肯定了笔为秦之首创。但原始的笔应该出现得更早一些。譬如西北地区出土的彩陶器，其彩绘便是用“笔”绘制的，而且极有可能使用的是毛笔。殷墟发现的甲骨文，亦有写好尚未刻好的骨片，看得出是用“笔”描写的。称笔为笔，倒确实始自秦。此后，笔之称谓不再更易，精制毛笔的笔工代有传人，秦之蒙恬不说，汉有李仲甫，魏有韦诞，晋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都出现了制笔高手。叶梦得《石林避暑录话》说：“自唐惟诸葛一姓，世传其业……得诸葛笔者，率以为珍玩。”且给了诸葛笔一个美称一翘轩宝帚。至于湖笔、湘笔中的精品，更是享誉古今中外，收藏家们视为可遇难求之物。近几年在知名拍卖公司的拍卖会上出现的清代18世纪青花矾红云蝠龙纹毛笔、竹雕番莲纹

笔都曾拍出12万~15万元的好价钱，更是令人大开眼界。《西京杂记》中载有刘歆记述的一种“天子笔”，据说“错宝为跗，毛皆以秋兔之毫，又以杂宝为匣，厕以玉璧翠羽，皆值百金”，是笔工路仓的拿手绝活。晚清有个寿石工，最好收藏毛笔。此人不喜食鱼，因而号不食鱼斋主人，一生所藏名人用笔逾百，著《重玄琐记》传世。后世收藏毛笔者，出其右者不多。

笔受宝重，与笔相关联的器物也应运而生。它们中的佼佼者有笔筒、笔山、笔洗、笔架、笔床、笔插、笔掇等等，因笔而成为雅赏珍玩。笔筒无疑是因笔而地位显赫的一个家族，这个家族中又以竹雕刻笔筒尤为优雅。

据说晋人王献之自制过一个竹笔筒，昵称其“裘钟”，虽已无从考究，但可信。渊源如此，也便绵绵不绝。清初竹雕大家吴之璠创作的滚马图竹刻笔筒就是其中之一。作者抓住马之仰卧欲翻滚未翻滚的一刹那，将其鬃须扫地而掀鼻露齿的神态定格下来，将旁立的骑士袖手回头的欣然状固化下来，于是人与马之间可托生死的情谊传神了。《收藏界》报道过一个百吉(鸡)图竹雕笔筒，图案主体为公鸡母鸡领着小鸡们嬉戏觅食，深雕四五层次，鸡群三四十只，题材新颖，工艺精巧，祝颂吉祥。与“滚马图”相比，“百吉图”是俗了些，但均为出奇制胜之取材，皆有卓尔不群的设计。今天继承竹刻

技艺的新秀之中有个湖南人吴贤军，年刚不惑，刀技却炉火纯青，尤以竹雕笔筒为妙，山水人物、花鸟虫鱼，样样上手，其作品已两度上拍，好评如潮。笔筒的图案题材当然不仅如此，传统题材中的“东山报捷”、“竹林七贤”、“松下对弈”、“文姬归汉”以及山水人物都别有佳境，为文房增添不少光彩。2005年5月，香港佳士得拍卖过一只康熙年竹雕山水人物笔筒，落槌价竟为1140万元。其光彩自是异常惊人，又一想，几百年传流已不易，雕工精妙更是难，古色古香，确也该这个价格捧走。

笔山亦名笔架、笔搁、笔格，自然就是歇笔之具了。唐代杜甫作诗说：“笔架霏窗雨，书笺映隙曛。”可见放置笔架的书案是在窗前的，唐人已很看重笔山了。五代后周的王仁裕著《开元天宝遗事》，特别提到有个叫苏颋的文化人，他有个很漂亮的笔架，由一块锦纹花石雕琢而成，令人眼羡。《收藏》刊发过一个配有原座的清中期哥釉笔山，五峰，寓有敢与三山五岳比高低和登高方望远的深意；奇的是五峰中的三峰可作小水盂使用，又寓天池高洁之意。一物二用，寓意深长，又有金丝铁线之美，实在小器而不能小看。近年拍卖场上出现过一件明代“亭台楼阁”山形铜笔架，仅长26厘米，落槌价25000元，那是六年前的事情，至今人们记忆犹新。

说起笔和笔的衍生器，真还忆起一则趣事。那是两年前的一个

上午，一对年轻夫妻来“玩家雅集”请我鉴定古玩，他们从手提包中取出一个锦盒，里面是个豇豆红小笔舔，直径不到6厘米，高不到1.5厘米（连圈足），小巧精致。从事古玩收藏和古玩鉴赏以来，我是头一次见到如此雅丽的豇豆红小器，其色如豇豆，红艳中带娇绿，犹如“潮霞”之初上，似乎刚从水中露出，有一种招人怜爱的感觉。尤为美妙的，是红中散布的葱绿斑点，红绿相衬，绿者更绿，红者尤红。笔舔为糯米胎，釉面温润熟滑，有散乱的岁月痕迹。我断为清中期之物，肯定它有收藏和经济价值。在写鉴定证书时，物主却与我争执起来，他不同意我写“笔舔”，要我写“笔洗”。我告诉他们，小而浅的“笔洗”实际上不是笔洗而是舔笔的笔舔，称之为笔洗并非不可以，但从功能上分别，“舔”和“洗”不同，盛水多而容积大方可洗，盛水少而容积小只能舔……夫妻俩却坚持要我改过来，非要写成笔洗不可。无可奈何，我只能改写一张证书，夫妻俩这才笑了。女士说，都说笔洗算文房用具，笔舔排不上队，不如笔洗价钱好。我这才明白，他们坚持要改“舔”为“洗”竟是为了提升价值。笔洗在收藏者心目中的地位，笔舔似乎是比不得的。中国嘉德七年前拍出一件豇豆红水洗，直径8.5厘米，落槌价竟到了15万元，难怪年轻夫妇要争其名争到底了。然而笔舔亦造型各异，材质有别，譬如我见过的一方上好端石雕琢成鱼龙变化的笔舔，又譬如我见过的一方和田玉雕琢成卧蛙的笔舔，小则小矣，价值就不见得比寻常

笔洗低了。

至于洗笔刷砚的池，则不能与笔洗相提并论了。书圣王羲之经常洗笔刷砚的池塘有好几个，绍兴其一，临川其二，皆为天然池塘，就因了书圣洗过笔砚，今日已成文化古迹，小小笔洗，是小巫见大巫了。

有笔当然要有墨。据说原始的笔称之为竹挺，“点漆而书”，便是原始的墨了。元代陶宗仪作《辍耕录》，就提到这段历史。明代刊印的《拾遗记》，亦提到“克树汁以为墨”，与《辍耕录》的提法是一致的。直至《述古书法纂》问世，才确切提到“刑夷始制墨……煤烟所成，土之类也”，该时为公元前827年的周宣王时期。可见，真正意义上的墨，其诞生年月距今已近三千年历史了。新中国建立之初，长沙等地曾发掘一批秦国墓葬，有石砚面世，且皆附带有砚石以磨研墨的。那时的墨为团粒状，不成形，直到东汉，墨才具有工艺形状，才正规生产。魏晋南北朝时成为学子们文房必备之物，且越制越精美，越制越奇巧，连可食以治疗疾病的药墨都跻身墨林了。

古墨是珍贵的收藏品之一。清康熙早年有个叫张仁熙的，他著《雪堂墨品》，记述宋牧仲收藏墨丸三十有六，就放置于张所赠之明代制墨大家吴叔大的雪堂墨匣之中。而唐人藏墨大家许芝刻石莲石匣宝重名墨，宋代蔡襄制豹皮囊珍护名墨的轶事，皆为古今传诵的

美谈。

尽管如此，历代名墨名匠总不至于被岁月风云所淹没。尤可一书的，是南唐人李超世代为墨付出的辛勤努力。

李超祖籍易州（今河北易县），原名奚超，为著名墨工奚鼎之子，世代以制墨为业。唐宋由于战事纷起，奚超携子奚廷珪逃至歙州，逐渐以制墨技高而名闻于世，南唐后主李煜善书画，好作诗，用过奚家父子的墨后备加赞赏，并赐以国姓作为奖掖，奚家父子从此改为李姓，其墨亦称之为李墨，当年便已无人不知。至李廷珪独立门户，宋室朝庭封诰乃至每写诏书，皆必用李廷珪的墨，上行而下效，市井要得一李廷珪墨便难上加难了，出现了“黄金易得，李墨难求”的局面。此后李氏一族名家辈出，李承洁、李承宴、李仲宣、李维庆、李维益各有建树，为墨的发展和改进做出了贡献。

明清时期程君房、方于鲁、罗小华、曹素功、汪近圣、汪节庵、胡开文等承前启后，引领墨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大步前进。其中汪近圣尤为享誉四方。他原是曹素功之墨工，艺成后独立门户，以“鉴古斋”名肆。《徽州墨模雕刻艺术》说他“法必宗于古，式必从其新”，是推陈出新的高手。其墨受到皇家赏识，清嘉庆、道光年间所制十匣贡墨、集锦贡墨皆为入贡珍品。清人认为他的制墨技艺可与李廷珪媲美。胡开文则是晚清墨业发展的首功者，墨品多达近200种，其

中不少是珍品名品，分号遍及大江南北，至今为世人津津乐道。

记得五年前应邀去浏阳一古玩收藏爱好者家中做客，说是做客，实是交流收藏心得。主人捧出一堆玉呀玛瑙一类的杂件供我赏玩，我忽然眼睛一亮，发现其中有一条墨，长条形，一面有阳文“徽州天开文制”，一面是阴文金字“革命精神”，上有青天白旗和铁血十八星旗交叉图案，一红一蓝，煞是艳丽。条墨头部平面“开文氏”三字阳文，一侧平面有“徽州天开文监制”七字阳文，几乎周身皆图字。很显然，这是胡开文传人为纪念辛亥革命专制的纪念墨，端整匀称，遍体蒙着一层“白雾”，古气扑面。比起传世的地球墨、御制棉花图墨、乾隆御制墨、文渊阁墨、御制耕织图墨等来，辛亥革命纪念墨年轻得多，名气小得多，但它是改朝换代的见证“人”，是开天辟地的“鼓乐声”，从历史文化的角度丈量它，是值是珍藏的。2004年上海拍卖出一组古墨，上书“胡越一家，开我民主，文德武功，造此幸福”，藏头为“胡开文造”四字，成交价达4万元，颇为可观。于是我希望主人割爱，返回长沙的路上，“辛亥革命纪念墨”与我结伴同行。

记得前年的春日，有位年已七旬的老太太来请我鉴定古墨。她从内衣口袋中掏出一个布包，抖开，是墨。一条已用去大半，磨面成斜削状；一条完整，皆为“胡开文墨”，有清香，遍体纹而不裂，蒙一层“白雾”，闪着蓝光，一看便知至少是二百年以上的古墨。老

人告诉我，墨是她父亲留下的，父亲去世前曾任省教育厅副厅长……父亲生前舍不得用，老人回忆，她只见父亲给远在北京小住的杨开智老先生写信使用过。平常，他用小布袋小心地装着，也不示人。我认为老人手里的墨是清中期的胡开文制墨，有收藏价值，她高高兴兴地走了。一晃几年过去了，老人的墨还在吗？她可能并不懂墨，但父亲惜墨如金，她继承父亲的意趣，惜墨，爱墨，寄托一份思亲情。曾经出现在拍卖场上的清同治年“螽斯衍庆”墨，也别有一番新意。“螽斯衍庆”是祝其子孙万代的意思，花钱上有，墨上则十分稀见，自然惹人注意，叫价到1.8万元成交。

墨的衍生器件不如笔的衍生器件多，只有墨床、墨匣、墨套等。唐人许芝制一石匣，周边刻上莲花，藏之以墨，时人昵称为石莲秘室，名字即风雅无边。北宋书法家蔡襄为“宋四家”之一，官至端明殿学士，他爱墨，甚至于购上好豹皮缝制精美皮囊贮藏，因此而有了“豹囊幽赏”的掌故。墨匣大多用木制，上漆或绘锦，实用而大方，今日的书画家多继承此法贮墨。

墨床则花样翻新。所谓床，卧具也。墨床，顾名思义，也即置墨品的用具，亦跻身文房之列。我曾鉴定过一具青白玉雕刻的墨床，呈书卷状，长不过10厘米，正面纹饰为浅浮雕一枝硕壮芦花，其下为一对鹌鹑，其寓意为一路(芦)平安(鹌鹑)。玉质青白，熟滑温润，质地不算上好，雕琢亦欠精膩，地子可见凹凸不平之处，可以

断为明代玉雕。放置砚笔之侧，研墨之后暂搁一下墨锭，也是透着几分文雅的。除此而外，微型几案式紫砂墨床、平背式伏蛙形瓷质墨床、诗文小板式竹雕墨床、镇纸型金属山水纹饰墨床等等，都曾出现在文房之中，为墨文化增添了光彩。

历史上墨的专著以《墨法集要》最为世人看重，为明代沈继孙多年心血之结晶。《墨法集要》专以油烟制墨为论述要旨，且从如何浸油至如何试墨一一详述，每一工序皆附有示意图，可谓图文并茂。可惜的是，此书原版早已不存，今日所见，只是乾隆年间从《永乐大典》中整理成篇的。尽管如此，依然使后人对墨的了解更深了一层。

纸的出现在蔡伦之前，这已是毫无疑问的问题。学者们几乎一致认为，蔡伦的功绩之伟大，在于改造了纸，总结并推出了一整套造纸的技术程序。西晋的太子少傅张华著有《博物志》十篇，其中便记述有蔡伦造纸的“始搗故鱼网”为材料，首开了创造麻纸的先河的过程。东汉元兴元年(105)，蔡伦将他实践的有效的造纸方法奏报皇帝，皇帝认为蔡伦在作一件大事，下旨按他的方法改革造纸技术，使造纸术迈进了使用树皮等多种植物纤维造纸的新阶段。到三国时期，魏国出了个左伯，他总结前人造纸的经验，不断实践，不断改革，创制出一种叫“研妙辉光”的纸，时人因尊重左伯，以“左伯纸”相称。

唐以后，纸已经百花争艳了，造纸工艺普及很快，各种加工纸亦已出现，北方的桑皮纸、安徽的宣纸、四川的蜀纸、江南的竹纸各有千秋。宋元明清以来，金银花纸、澄心堂纸（宋仿）、红色笺纸、羊脑笺纸、白云母笺纸、连四纸、白鹿纸、白鹿宣、北迁南宣、四川宣纸等等不一而足，形成了庞大而繁杂的纸的家族。

我记起一段关于纸的往事来。那是1982年秋冬之交的日子，我所在的文化部门组织了一次外出“考察”活动，我也弄不明白，怎么一考竟考到河北迁安去了。前往迁安的旅途，有很长一段路是荒凉的沙质土地，放眼望去，土黄色的原野无涯无际。陪同我们前往迁安的是石家庄市文化局的一名职工，一路上他讲得最多的是风沙，我们驱车从唐山赶赴迁安的路上，印象最深的也是风沙。参观的重点，是迁安的迁安纸厂。厂里的负责人说，迁安宣纸纯净柔软，纤维细长，吸墨性能好，因此日本人最喜欢迁安宣纸，每年的出口量都不小。临走，迁安纸厂竟送了我们一行13人每人一百张宣纸。我注意到，对绘画和书法断无了解的几位，对厂方这种慷慨很不以为然。我的迁安纸可是派了大用场，日后分别送了几位书画家，至今还留有一二十张四尺整纸，很是珍惜。

还有一个有关纸的故事。那是1999年的春夏吧，省委机关事务局一位老朋友找我去，见面便谈纸。他说，1974年因毛泽东要在长

沙小住了些时日，机关事务局特意印制了一批红栏竖写的大幅面笺纸，专供主席用毛笔或铅笔书写。主席离开湖南后，这批纸尚剩一二百张，派不上别的用场，又算不上什么贵重物品。他说，听说你搞收藏是为了收藏历史文化，不如送给你去收藏。我看了纸，很兴奋，谢了他，随即带回了家，至今珍藏。想想许多的“主席瓷”主席连见都未见过，更不用说使用，但确为主席筹制的，身价才如此不凡。这些纸是供主席用的，据机关事务局的朋友说，主席用了一大部分，这是剩余的，其珍贵意义，该是可想而知的。

纸的价值因为包容了各种特定意义而身价倍增。比如金粟山藏经纸原是浙江海盐(今海宁县)金粟山下之金粟寺刊印藏经的专用纸，每幅皆钤有“金粟山藏经纸”红戳，“莹白可爱，有黄白经笺，可揭开用之”。这种纸始产于宋，明代人最喜欢，清代便有人仿制了。又比如日本人大村西崖所著《中国美术史》提到“花格之白鹿笺、蜡研五色笺、月白笺、罗纹笺等为世所喜”，其中的白鹿笺即安徽新安生产的笺纸。这种纸名盛当年，因帘上绣有花格而得名，属特种净皮宣纸一类，清亮透明，匀净柔和，受墨性好，但制作工序繁杂，工艺难度较大，故产量不高，供不应求。

古纸留存下来的殊为稀少，曾经发掘出土的古纸有东汉纸，其上发现有字迹，可见其质量已不俗。湖南湘西曾经从元代墓葬中发

掘到一份纸质广告，环境若此，能保存数百年不朽，亦可见质地不错。晚清由北京荣宝斋监制的书画宣纸在古玩市场出现过一批，长沙易先生视为至爱，收藏后轻易不让人观赏。后来听说出让了几条(对开幅画)，四五千元一条，听说而已，未亲见。

造纸技术是从中国传播至全世界的，大约在隋唐时期，东到日本，西到原苏联的乌兹别克，及至伊拉克、叙利亚、埃及……公元8世纪，阿拉伯人学会了中国的造纸技术，很快传播到欧洲、非洲，又通过西班牙传到俄国、美国。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，造福于世界各国。

因纸而衍生的文房器物书香气很浓。譬如镇纸，又称书镇的，宋人陶谷作《清异录》，其中特别提到欧阳通家中珍藏许多的书镇，昵称为“套子龟”、“小连城”、“千钧史”等，宝重之情不言而喻。欧阳通是唐代大书法家欧阳洵第四子，潭州临湘(今长沙)人，书法虽稍逊于其父，但世称“大小欧阳体”，同样名传于世。他使用的书镇，不会逊色他人的，闻名即如见其镇，雅气十足，书香很浓。书镇产生的年代很早，长沙坡子街前几年大搞基本建设，挖土方深达10余米，渣土倾倒在捞刀河和水陆洲。有几个有心人想到深土中必埋有古物，于是自备了套鞋、铁铲以及金属探测仪去翻寻渣土。果不期然，不单找到了数量可观的“马殷钱”，且还有长沙窑器、青瓷器，甚至还找到了紫铜双蝠镇纸、铁制坐蛙镇纸等。通过鉴定得知，紫